◎文学聚焦

红色经典在世界的传播

何明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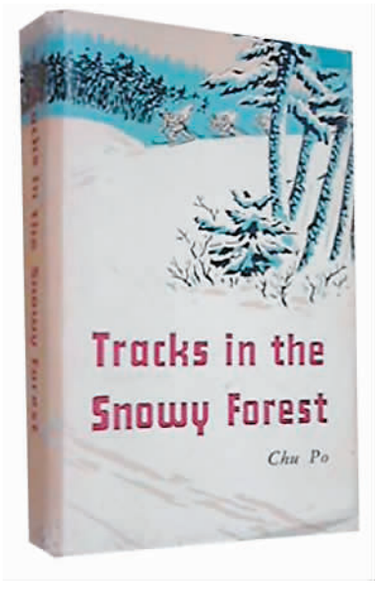
红色经典所以能够在海外获得广泛传播，其主要原因在于用大量的历史细节，真实、鲜活体现了时代精神风貌，因此获得了海外具有舆论领袖地位的文学批评期刊以及相关舆论精英的高度关注，并逐渐影响到普通读者。

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书写者！中国文学曾经成功地书写过中华民族站起来的时代，这个先行探索者，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涌现出的一批红色经典。这些红色经典，自出版以来便拥有了海内外广泛的读者群，特别是获得了海外学界、舆论传播界的高度关注，历久弥新。今天研究其在世界上获得广泛传播的原因，对于当代文学如何抒写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历程，具有非同寻常的启示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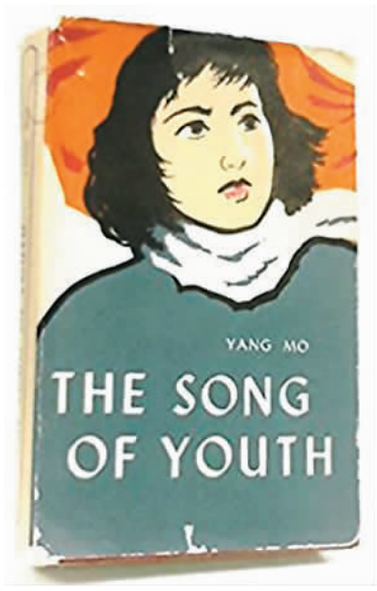
精神力量是文学永恒生命

红色经典，通常以“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为代表，即《红岩》《红日》《红旗谱》《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实际上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涌现出的一大批反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土地革命等时代巨变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中无不贯穿着一种昂扬的精神力量，展现的是中华儿女在时代浪潮中超越个体局限实践革命理想的精神历程。由于作者绝大部分是这些社会巨大变革的参与者、亲历者甚至是领导者，因此故事鲜活、细节真实。作品中洋溢着的蓬勃、高昂的理想主义精神，是这些红色经典历久弥新、并具有不朽的生命力的主要原因。

这批红色经典最初走向海外，外文出版社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外文出版社几乎与中文版同步，先后将这批红色经典逐一翻译成为各种外文版在海外发行。如1953年出版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英文版，对外首发2万册），1954年出版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英文版，对外首发1.5万册），1955年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英文版，对外首发1.8万册）和徐光耀的《平原烈火》（英文版，对外首发1.2万册），1958年出版杜鹏程的《保卫延安》（英文版，对外首发6000册），1961年出版吴强的《红日》（英文版，巴恩斯译，对外首发1万册）、梁斌的《红旗谱》（英文版，戴乃迭译，对外首发1万册），1962年曲波的《林海雪原》（英文版，沙博理译，对外首发2.5万册），1964年《青春之歌》（英文版，南英译，对外首发5.8万册）。苏联以及中东欧等国家也先后翻译出版了《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小二黑结婚》等俄语版以及中东欧国家语种。由于这批红色经典极其鲜明的文学特色，因此在海外一面世，就获得了海外学界、媒体界以及相关领域的高度关注。如《林海雪原》英文版出版后，很快就有俄语版、阿拉伯语版、挪威语版、日语版、越南语版、希腊语版等10多个外语版本相继面世。其中日本出版社出版的日语版就有两个，一是1961年出版的冈本隆三的译本；另一个是著名翻译家饭冢朗1962年的译本，在日本145家图书馆都有收藏。《林海雪原》1962年的英文版，在全世界收藏图书馆达到75家；1965年外文出版社再版时增加到110家；1978年第三版为75家，三个版本合计达到271家图书馆。



《林海雪原》1965年英文版



《青春之歌》1978年英文版

《青春之歌》也有20多个外文版，除英语、日语外，还有阿尔巴尼亚语、德语、韩语、泰语、西班牙语等。外译最早的是日语版，由著名汉学家岛田政雄、三好一翻译，1960年由至诚堂出版，比英文版早两年面世，到1965年已经印刷了12次，日文版累计发行了20万册，1977年日本青年出版社又再版了这一版本。1960年5月至7月，《青春之歌》电影在日本东京等地放映了36场，受到日本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的热烈追捧。

《青春之歌》的英文版影响最大，外文出版社1964年出版后，全世界收藏图书馆分别为50家，1978年再版时扩大到142家。从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英语国家，到欧洲的法国、德国、丹麦、瑞士、瑞典、荷兰、西班牙，再到中东的以色列，亚洲的新加坡、泰国、日本、韩国，还包括拉美的巴巴多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图书馆都有收藏。

随着这批红色经典外文版在海外的广泛传播，欧美主流学术界、媒体界对这些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文学作品给予了高度关注。英国伦敦大学的《中国季刊》，美国哈佛大学《亚洲研究学刊》、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大学《当代世界文学》（1977年之前刊名为《海外书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中国文学》、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现代中国》，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荷兰莱顿大学的《通报》等欧美影响较大的主流学术期刊上，很快就出现了相关研究文章。根据JSTOR数据库的检索，在这些主流学术期刊上，今天能够检索的文学批评中，提及的作品就有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欧阳山的《三家巷》、梁斌的《红旗谱》、杨沫的《青春之歌》、杜鹏程的《延安保卫战》、吴强的《红日》、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艾明之的《火种》、柳青《创业史》等等50多部文学作品。

欧美一批知名学者、专家纷纷发表相关研究文章或者书评，如美国汉学家毕晓普、雷金庆、葛浩文、邓腾克，法国汉学家巴狄，荷兰汉学家佛克马，澳大利亚汉学家杜博妮，德国汉学家卫德明等。在最有影响力《中国季刊》上，1963年专门集中刊发了三篇美国学者的研究文章，分别由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中国台湾学者夏济安、德国汉学家卫德明、美国学者白芝等撰写，专门研究《青春之歌》。不论从哪个角度，都共同认定《青春之歌》是一部充满了英雄主义激情的作品，“激情”是这部作品的核心。汉学家毕晓普在1964年的一篇书评中提到了《林海雪原》，认为该书融合了细致的悬疑、幽默、英雄事迹等等，对正反面人物的描写区分非常明显。澳大利亚《中国研究》杂志在1979年发表的一篇学术文章中，将《林海雪原》的杨子荣与《红岩》中的江姐、《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红旗谱》中的朱老忠一同作为共产主义理想的化身，表现中国共产党员为共产主义事业奉献一切的英雄形象是成功的。

在全世界最大的读者网站Goodreads上，今天仍然能够找到读者对于这批红色经典的评论。一个37岁的女图书管理员，2015年在Goodreads上发表读后感，认为《林海雪原》内容有趣、十分吸引人，并为书中的人物精神所感动，该书让美国读者对故事发生的中国时代背景有了一定的理解。弗吉尼亚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罗福林教授今天仍然向该校研究生、本科生们推荐《林海雪原》一书，他认为《林海雪原》等红色经典是中国文学的代表，特别是对中国语言的运用通俗易懂。来自斯里兰卡、尼泊尔、巴基斯坦、加拿大和美国的13位读者对《青春之歌》给予了评分，有位读者认为该书“精彩地描写了在社会改造过程中的青春热情”；有位印度的读者在2010年的留言中甚至表达了感激之情：“《青春之歌》这本书让我进入了共产主义文学的世界。它将我带入文学的大门，因此在我心中有特殊的地位。这本书我至少读了5遍，我之所以阅读中国文学，都是因为受它的影响。”

可见，这批红色经典能够在海外获得广泛传播，主要原因在于用大量的历史细节，真实、鲜活体现了时代精神风貌，因此获得了海外具有舆论领袖地位的文学批评期刊以及相关舆论精英的高度关注，其影响范围逐步扩大、并逐渐影响到普通读者。从上个世纪50年代至今天，以这批红色经典为源头，在国内不断被改编成为舞剧、歌剧、京剧、连环画以及电影、电视剧，影视媒体的传播，再次增加了这些红色经典作品的感染力，并获得不同国家以及地区读者的共鸣。可见，红色经典展现的精神力量，正是支撑中华民族能够站起来的时代力量。精神力量才是文学活动的永恒生命力。

塑造中国文学的精神品格

红色经典描写了一大批朴厚、正直的劳动人民形象，一大批不畏艰险、勇于奋争、舍生取义和无私奉献的革命者形象，其中革命理想主义的精神是其普遍的特征。经历了战火硝烟的洗礼，在中华民族终于站起来的特定时代里，革命理想主义精神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提供了精神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它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任务。无数可敬可爱的先烈们展现的纯洁高尚、可歌可泣的献身精神，永远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价值，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等一批红色经典在世界范围获得了广泛的传播。中国当代文学，要开阔胸襟，着力于抒写超越个体情感体验的普遍性的精神力量；要放眼天下，站在世界化的高度认识和理解中国的富强时代，彰显时代的世界性价值，才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书写富强时代的精神，是红色经典给予今天中国文学最有价值的启发。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国文化走出去效果评估中心执行主任）

◎新作评介

描绘新时代的文学力作

——评何建明新作《那山，那水》

马　娜

作为第一部以文学阐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报告文学作品，作家何建明的新作《那山，那水》自9月在《人民文学》发表和红旗出版社出版以来，不仅连续位居九、十月光明日报“好书”榜首，发行突破20余万册，数十家报刊连载转载，而且成为当前宣传中共十九大精神的热门辅导教材。

一部优秀的作品，就是一个时代的先声和思想结晶。何建明的《那山，那水》，讲述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重要思想如今已写入中共新的党章。习近平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是在2005年8月15日在浙江安吉余村提出来的。十余年来，习近平的这一思想在余村、在安吉、在浙江和全国各地早已深入人心，尤其是在安吉和浙江大地已经产生了令人振奋与鼓舞的效果。何建明在中共十九大之前，就五下安吉和浙北地区，对当年习近平发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过程和这十余年来当地在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不断改变传统和落后的生产发展方式，走出了一条以生态文明为主要内容的大力发展旅游与文化经济为骨干产业的美丽乡村建设全新发展道路，并由此产生的历史性变化，进行了全面而详细的调查采访，以生动优美的文字记录了余村和安吉及浙北地区的这种变化。

作品的可贵之处在于，第一个以生动和可感的文字，记述了当年习近平发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重要思想的过程和现场。一个伟大思想和重要理论的诞生，开启了一个伟大的时代，文学能把这样的思想和重要理论的诞生过程生动地呈现出来，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贡献。而《那山、那水》的作者为了让这一伟大历史瞬间的精彩而准确呈现更加可信、可感，还让亲历这一事件的当事人进行了更加细致的描述，使得习近平重要思想的产生过程更具真切的现实感和历史感。

作者通过对浙北地区、对安吉和余村的一次次实地调查采访，以亲身的感受，在作品中通过已在中国局部产生并将影响整个中国发展前景的事实，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与毛泽东当年在井冈山茨坪村发表的“农村包围城市”和邓小平肯定安徽小岗村分田到户的伟大科学论断，相提并论。它体现了一个作家的政治敏锐，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慈溪，以袁可嘉之名走近诗歌散文

杨　鸥

浙江慈溪，“九叶派”诗人袁可嘉的故里，日前迎来了一场以袁可嘉之名集结的盛会——第三届袁可嘉诗歌奖暨首届《十月》散文双年奖颁奖典礼在此举行。本次活动由《十月》杂志社、慈溪市人民政府主办。诗歌奖获奖诗集为蓝蓝的《唱吧，悲伤》，翻译奖为傅浩的《噪音使整个世界静默：耶胡达·阿米亥诗选》及刘文飞的《库舍涅尔诗选》，诗学奖则由张清华的《像一场最高虚构的雪》获得。首届散文双年奖获奖作家为3位，李敬泽获得杰出成就奖，李娟、贺颖获得青年作家奖。

慈溪袁可嘉故居展品

袁可嘉是著名诗人、学者和杰出的诗歌翻译家，是向中国介绍西方现代派诗歌最早、最有影响的中国学者之一。正如诗学奖获得者张清华所说，上世纪80年代以来，自己最早接触的西方现代派作品就是袁可嘉编著的《外国现代派诗选》。据《十月》杂志主编陈东捷介绍，创设袁可嘉诗歌奖是为了纪念袁可嘉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出的巨大贡献，弘扬袁可嘉独立、先锋、开放的学术精神，奖掖当下最有成就的诗人、诗歌翻译家和评论家。该奖每两年举办一次，本届袁可嘉诗歌奖的得奖范围框定在2016年6月到2017年7月，共收到参赛的个人诗集200余部、翻译作品集20余部、诗学文集近20部，来自于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以及美国、澳大利亚等。经评委会严格评审，评出个人诗集1部、翻译诗集2部、诗学文集1部。

诗人蓝蓝的获奖作品《唱吧，悲伤》以严谨的结构、沉潜的语言、内在的真情，抒发了诗人对现实生活和所面对的这个世界的认知和领悟。翻译家傅浩的获奖作品《噪音使整个世界静默——耶胡达·阿米亥诗选》让无数中国读者走进了以色列诗人阿米亥独特而迷人的诗歌世界，也让阿米亥的诗歌深刻影响了许多中国诗人。翻译家刘文飞的获奖作品《库什涅尔诗选》以出色的翻译，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了俄罗斯代表性诗人库什涅尔的独特风格和基本调性。评论家张清华的获奖诗学文集《像一场最高虚构的雪》从诗意深处提取公共性和时代感，将之溶解于多向度、多层叠的个人风格，构建开阔高蹈的诗学视野。

《十月》散文双年奖同样为两年一届，以“铸造品牌，提高地方文化软实力”为目标。李敬泽的《会饮记》系列有一种沉重的轻逸，修辞创新的背后，隐藏着作家关于文学、哲学和信仰的总体性思考。李娟以沉着而丰沛的叙述，发现和重构了阿勒泰的风土人情和微观现实，赋予其纯粹而盎然的诗意。贺颖在新作《另外的门》里，以自身灵魂的重量和丰厚的精神收藏，在地坛，与史铁生展开灵魂的对话，呈现出自身，呈现出史铁生，也呈现出另一个世界。

李敬泽在获奖感言中表示：“在写作的道路上，我们要永远保持新的锐气，保持刚刚提笔写字、刚刚对这个世界开口说话的态度，这是幸福的。”李敬泽为当地文学爱好者作了散文讲座。

◎作家谈

以独特视角写北京

叶广芩

一个作家在他成长过程中要不断补充新的文化因素，要不断学习、不断地吸收，这样你的写作生命力才能长久保持下去

我认为，对于北京来说，新的经济建设和老的北京是一脉相承、不可分割的。北京的文化、北京的文脉是不能断的，必须有文化的积淀、文化的承载和托举，才能使北京真正地站立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面前。这种传承是我们作家所应该承担的一个责任。

我从小生在北京，至今保持着北京情结、北京的思维方式、北京的语言。虽然青年时代就离开北京，和一大批北京学生到陕西，在陕西生活了50年，但是从语言习惯一直到性格，不能改变的还是北京市民的思维和性格。我出生在大宅门，我母亲却生活在南营坊——朝阳门外集市口群杂之地，这种碰撞造成我性格既有大宅门的理念，也有贫民窟的理念，所以现在让我写起北京，尤其是过去的生活的确有信手拈来、游刃有余的感觉。

大家把我的作品列入了关于老北京的写作。我在陕西生活将近50年，它给我的积淀难以一言说清楚，苦辣酸甜都有。陕西埋了近百个皇上，它的厚重的文化积淀对于一个作家是非常得天独厚的文化营养，有了这种积累回过头来再看北京就有了一个崭新的视角。退休后我回到北京，觉得北京不是我过去的北京，但是北京还是北京，几个月不上街就不认识北京是什么样，更何况我离开了50年回到北京，北京的陌生感更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情愫。

我想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视角，这种游子的心态，使我对北京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这种认识会反映在文学作品里。我在陕西的时候曾经在周至县挂职9年，我下去的时候有人问我，陕西不缺反映乡土文学的作家，有贾平凹，有陈忠实，我说他们这些人是背靠着黄土、在黄土中滚爬出来的，信手拈来都是非常典型的陕西的风格、陕西农村生活。但是我是代表了城市人，代表了在北京长大的人的独特的视角，所以我的写作和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我回到了北京，我和在北京土生土长的作家们又是不一样的视角：他们是在北京成长起来的，他们的素材在今天也是信手拈来，都是关于北京发展、北京今天的非常可贵的素材；而我的视角是带有外来人看北京的视角，所以我对下一步的创作充满了期待。

一个作家在他成长过程中要不断补充新的文化因素，要不断学习、不断地吸收，这样你的写作生命力才能长久保持下去。

我们这一代作家，到我这里，至少赶上一个好时候，科学的进步、时代的发展，网络使我们展开了一片广阔的视野，使我们和读者有了一个更深层次的交流。都爱说“粉丝”这个词，但是我从来不愿意提粉丝，我把它列为读者，每个作家都有一大批自己的读者，通过网络我们和这些读者有了直接的交流。正是因为这些读者对你作品的喜爱、理解和对你的支持，使你的作品有了发展的可能性。所以，今天的作家是幸运的，时代对我们是支持。我的那些“粉丝”读者们，和我不是名义上的交流，而是实质上的交流，比如说中秋节的时候他们会提出，我们一块到颐和园赏月吧，在颐和园他们会对我的作品提出批评，提出一些非常中肯的建议。有了这些建议、这些批评，我们对于自己的作品和写作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有了进步的可能。所以，我们这一代作家一定要和我们的读者紧密地联合起来，借助我们的科学发展，使我们的文学创作向更高台阶迈进一步。